

外向型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研究所资料室

一九八八年五月

前 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对外开放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的思想指导下，随着“开放、改革、搞活”政策的贯彻执行，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经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据统计，1987年，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其中出口总额395亿美元，增长27.8%；1979—198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362.1亿美元，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华投资，共批准“三资”企业10,008家，其中中外合资企业4,600多家，合作经营5,190家，外商独资企业183家，已投资营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4,300多家；1987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取得新进展，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金额1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3%，完成营业额11.1亿美元，增长13.5%。无论从广度或深度看，我国的对外开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对外开放过程中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其中突出的是外汇短缺。自1984年起由于经济超高速发展，在进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连续几年出现贸易逆差，1984年逆差为12.7亿美元，1985年高达149亿美元，1986、1987年分别为120亿美元和39.4亿美元；与此同时，我国的非贸易收入却成绩不大，尚难以成为弥补外贸逆差的有力手段，故1984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连续几年出现较多逆差，并牵动了国家外汇储备的迅速下降，1984年底国家外汇结余为82亿美元，1986年则下跌到14.9美元。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看，靠大量举借国外贷款或压缩进口解决本国外汇短缺的办法并不是长久之计，可供选择的策略是实行我国对外经济战略的转变，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使我国产品打进和占领国际市场，以赚取更多的外汇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为了使越来越多的同志对外向型经济的理论和实际有较多的了解，更好地推动和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研究所组织了一些同志成立了《外向型经济参考资料》编辑小组，由周世超同志负责。本书主编：刘国强、冯礼兴，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王鸿茂、彭崇光、张互帮、郁方、黄永耀、刘辉、李珊、陈朝阳等同志。

由于本书资料是从众多的国内外书籍报刊资料中整理、编辑而成，名目繁多，故不能一一列举作者及出处，在此向广大作者致谢，并请谅解。

外向型经济在我国实践及理论研究对我们来讲还是个新的事物和新的课题，由于水平有限，加上时间匆忙，缺点、错误肯定不少，望专家学者、实际部门的同志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广州

目 录

第一部份 领导、专家学者论外向型经济

一、邓小平、赵紫阳、李鹏论对外开放·····	(1)
二、赵紫阳谈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4)
三、外向型经济：广东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选择和挑战·····	(9)
四、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	(12)
五、大进大出：把沿海企业抛到国际市场中去 ——关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外贸体制改革的思考·····	(16)
六、实行外向型发展广东经济的战略·····	(21)
七、广州外向型经济现状、问题、前景和建议·····	(34)
八、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考虑·····	(42)
九、海南外向型目标：经济要素双向流动的自由经济区·····	(46)
十、论外向型的台湾经济·····	(50)
十一、论广州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资金对策·····	(56)
十二、选择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汕头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60)
十三、论珠江三角洲外向型农业发展的目标和对策·····	(63)
十四、外向型经济研究观点综述·····	(68)

第二部份 国内外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功经验

一、日本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本作法·····	(74)
二、亚洲“四小龙”怎样发展外向型经济·····	(76)
三、新加坡怎样发展外向型经济·····	(78)
四、南朝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与教训·····	(81)
五、香港怎样转向外向型经济·····	(86)
六、出口带动增长 ——智利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启示·····	(87)
七、广州积极朝外向型经济发展·····	(90)
八、蛇口 ——我国第一个形成外向型经济的工业区·····	(92)
九、东莞市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	(94)
十、桂洲镇外向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99)
十一、开拓外向型生产企业 增强出口创汇能力·····	(103)
十二、广东番禺县大岗镇办好外向型企业的几点经验·····	(105)
十三、台湾外向型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107)

附录一、名词解释·····	(110)
---------------	---------

附录二、对外经济与贸易统计图表·····	(121)
----------------------	---------

附录三、外向型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索引·····	(130)
------------------------	---------

第一部份 领导、专家学者论外向型经济

邓小平、赵紫阳、李鹏论对外开放

(一)

为了实现在本世纪内的发展目标以及在下个世纪的更大目标，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对外开放，而且对内也要开放；不仅本世纪要开放，下个世纪仍要继续开放。没有这一条，中国就不可能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几年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也暴露出一些弊端。总的说，我们还缺乏知识。知识不多，本领就不大；本领不大，勇气就不够。不克服这些，我们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日本经济的起飞是由于大胆地引用了外资。这里除大胆外，还要加一个会使用外资。这个本领，我们同日本经济起飞时不同。要自己会使用，会加工，走自己的道路，起飞快，而我们就缺乏这个。当然，现在还存在一个客观原因，在引进外资时，在技术转让上还不够积极。因此，使管理人员胆子更小了。所以，克服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我们要更加开放，创造更加优越的投资环境，勇于和敢于使用外资；另一方面希望外方在中国投资时，在技术转让方面更加开明一点。很简单的道理，让人家来投资，不赚钱是不行的，费用太高，就赚不了钱，这方面不下决心不行。换一句话说，开放条件和投资条件也要合理，也就是赚得太多也不行。目前的关键问题，还是环境不好。我曾听到过外商这样评论，对天津的情况认为还比较好。可惜，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管理人员都很少。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要大胆地使用外资，为外商投资创造合理的、比较好的条件。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还发现很多问题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提倡改革。克服这些问题，不从改革着手不行，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解决这些问题，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也牵涉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问题复杂得很。找出一个头绪来，要花时间，我们准备用一年的时间理出一个头绪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当前经济发展顺利，是可喜的，但面临的问题也是一大堆。

对外开放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政策。有人担心中国的法律会变。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投资没有风险，我们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还可以补充。最近全国人大通过的外资企业法就是为了给外国来华投资创造有利条件。我们没有资本家，如果说有，就是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家，中国本身没有资本家，国家收入必须用于整个国家的福利。

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就是发展经济，同时也提倡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使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摘自邓小平1986年与外宾谈话)

(二)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出口创汇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影响着国内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进程。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和我国的优势，积极发展具有竞争力、见效快、效益高的出口产业和产品，大力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合理安排出口商品结构，多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以争取出口贸易较快地持续增长。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发展劳务出口和技术出口，努力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进口的重点要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凡是适宜于国内生产的重大设备和其他产品，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做到立足于国内。积极发展替代进口产品的生产，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加快国产化进程。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贸易，必须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

对于国外资金的利用，要根据偿还能力和国内资金、物资配套能力，保持适当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大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综合经济效益。要进一步健全涉外经济立法，落实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正确确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规划，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开展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以充分发挥它们在对外开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

(摘自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三)

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日益增强。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外投资的扩大，为我们进一步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必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以沿海经济的繁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们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已经形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发挥现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的作用，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对广东、福建和海南岛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建立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积累经验。根据海南岛独特的历史、地理和资源条件，国务院建议成立海南省，把海南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现有经济特区更加优惠的政策。海南岛开发建设的任务很艰巨，工作要扎扎实实地进行。必须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坚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分片建设的方针，从改善投资环境入手，逐步建立起更加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结构。

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地区，立足于本地优势，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优势，实行“两头在外”(即原材料来源在外和产品销售市场在外)，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参加国际交换。在发展外向

型经济中，沿海工业城市和经济特区要走在前头，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增加出口创汇中的骨干作用。要特别重视利用沿海农村劳动力的优势和现有乡镇企业的基础，发展外向型企业和创汇农业。大力发展沿海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积极向内地转让技术、管理经验和输送人才，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发挥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有紧迫感，决不能贻误时机，但也要有坚韧不拔的艰苦创业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基础工作。在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必须按照生产力合理配置的原则，统筹规划全国的经济的发展。内地要利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会，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并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对外开放中迈出新的步伐。

适应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的改革。外贸体制改革要坚持“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针，打破“吃大锅饭”的体制。从今年起，在全国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外贸出口创汇、向国家上缴外汇包干，适当调整外汇留成比例，给地方创造良好的经营条件。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进出口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大多数商品的经营权下放到地方，并相应下放经营机构。必须把承包经营责任制落实到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以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全国性的外贸、工贸进出口公司，要逐步向综合性、多功能和国际化方向转变，有计划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上来，积极为国内的外贸企业提供服务。加速推行进出口代理制，进一步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推动外贸事业的全面发展。

增加出口创汇是扩大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基础。按照择优出口的原则，逐步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发展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和完善国际市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努力做好国内市场需要和外贸出口的统一平衡，加强出口贸易的协调管理工作，发挥外贸、物价、财政、税务、银行、海关、商检、外汇和工商行政等部门的管理职能，审计和监察等部门的监督职能，外贸商会的协调职能，以保证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积极开拓国际承包劳务市场，加强管理和协调，进一步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大力发展旅游事业，积极开发旅游资源，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服务质量，改善经营管理。根据讲求经济效益、促进科技进步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原则，进一步调整进口商品结构。技术引进的方式要多样化，防止盲目性，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创新，发展进口替代，加快国产化进程。

利用外资要广开渠道，根据偿还能力和国内资金与物资的配套能力，保持适当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正确引导投资方向，提高使用外资的综合效益。重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注重利用现有企业同外商进行合作，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办事效率，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使外商能够按照国际通行方式在我国投资和经营。

（摘自李鹏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赵紫阳谈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去年11月下旬以来两次到上海、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市考察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赵紫阳同志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指出，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很好。尤其是外商前来投资的大量增加，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势头。大量事实说明，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今后一个时期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可能大大提高一步。

有利的机遇和我们的发展战略

赵紫阳指出，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有利的机遇。随着劳动费用条件的变化，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在这次转移中，我国沿海地区应当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里劳动力费用低廉，素质比较高，交通方便，基础设施也比较好，特别是科技开发能力比较强。这是我们的优势。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把大批外资吸引进来。

赵紫阳说，我们在历史上曾经错过几次发展良机，这次不应再错过，我们做工作要有紧迫感。

他说，为了抓紧利用当前的机遇，沿海地区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总的来讲，沿海地区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要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

如果我国沿海这一片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还有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能够真正走到国际市场上去显身手，找出路，真正转到外向型经济的轨道上来，那么，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够加快发展，能够提高水平，而且势必有力地带动中、西部的发展。这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战略意义。

赵紫阳指出，实现这个发展战略，要把握住几个要点。首先，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而且费用低廉，劳力素质比较好。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实际上是一种以产品为载体的劳务出口，应当积极发展。我们的煤多，可以发电。沿海地区要把电力建设搞上去，为兴办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能源条件。我们既有丰富的费用低廉的劳动力，又有煤炭和砂石，这就可以大力兴办建材工业，这也是一项很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的建材出口，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沿海地区的广大农村，要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努力把创汇农业搞上去。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经济特区、中心城市和某些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搞些高技术产业。但从当前总的情况来看，大量的还是要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容易起步，适合我国沿海许多地方当前的条件。

其次，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随着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和内地经济的日益发展，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路子只靠国内的原材料，沿海和内地争原料的矛盾势必越来越尖锐，这是行不通的。因此要提倡和鼓励沿海地区到国际市场上去进口原

材料，加工增值之后，再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大进大出。要鼓励地方把留成外汇用作周转外汇，大力开展“进料加工”。当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发展替代进口的元器件生产和原材料工业，以提高增值量和出口产品的等级。

赵紫阳说，利用外资的重点应当放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即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这样就使外商和我方有了共同利益，外商会主动关心产品质量，关心技术的更新，关心企业管理和产品销路，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

赵紫阳说，实现上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对原来的外贸体制进行改革，为地方和企业创造一个随时能进能出的环境和条件。

我国现行外贸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吃大锅饭。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就可以发挥出很大的潜力。

他说，在改革问题上，我们是要谨慎、慎重。我们够谨慎的了。小平同志多次向我们讲，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冒风险。小平同志的意见非常重要。如果老是犹豫来犹豫去，“足将进而趋，口将言而噤”（按：句见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那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把时机都耽误过去了。当然，我也不主张冒险主义，但该决断的一定要决断。吃大锅饭的问题不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他说，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我在十三大报告中说了四句话：“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这里面关键是自负盈亏和放开经营。自负盈亏是基础。自负盈亏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不解决，这样的改革、那样的改革都无法很好地进行。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解决了放开经营的问题，产销才能结合，工厂才能在国际市场的较量中得到锻炼，逐步适应国际市场上的千变万化。

赵紫阳说，我们是在国内价格体系很不合理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外贸改革最卡壳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现实条件下，要提出一个好的自负盈亏的方案是很不容易的。从中央来讲，当然要尽可能地考虑到各种因素，力求搞得合理一些。从各地来讲，要准备出点代价买个好政策，要勇于承担任务，要打一点积极性在里头。

赵紫阳说，与外贸有关的还有两个问题：第一，我建议各地要尽可能挤出一些留成外汇用于周转外汇。当然，中央也可以拨一些给地方作为周转外汇。这是解决大进大出所需外汇流动资金的有效办法。第二，要建立农副产品风险基金，沿海地区的经济要更加密切地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就有一个如何缓解国际市场波动造成的影响问题。国际市场上有几种东西的需求和价格是经常大起大落的。我们这么大国家必须有一点吞吐库存。这样国内的价格可以适当稳定，并能提高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

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

沿海地区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一定要认真解决政策、体制和企业机制方面的问题，我们政策的着眼点，应是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潜力挖掘出来，让大家紧紧张张地去干事。这样，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才有希望。

这几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机制，潜力无限。反过来，机制不好，必然困难重重。近两年，我们在改善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上做了很多工作。这方面的工作还要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使大中小企业全盘活起来。但是也要看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大中小企业要想一下子搞得很活是困难的。而小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机制非常好，一开始就搞得很

活。现在看，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赵紫阳指出，乡镇企业一出生，就有一个自负盈亏的体制。它是在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竞争得好的才能发展，竞争得不好要改行，再不好就得关门。它的竞争意识、生存意识特别强。它经营灵活，架子小，具有应变能力，服务态度好，交货期短，外贸企业就很愿意和乡镇企业打交道，外商也愿意与乡镇企业合作。一般说来，乡镇企业没有那么多的多余人员，他们是满负荷运转的。由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一般都关心技术进步，注重开发新产品，乡镇企业的这种机制，对于生产出口商品，是很有利的。它不仅适合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而且非常适合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最近几年，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乡镇企业已形成很大一片，朝气蓬勃，发展非常迅速。许多乡镇企业是在很简陋的条件下搞起来的。现在改变了模样。在苏州吴江县，我看了一个纺织厂，用的是瑞士产的先进设备。不少工厂盖了新厂房。就乡镇企业的厂房设备来讲，与我们的国营工厂相比并不逊色。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在沿海地区出口创汇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直线上升，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上外向型轨道，增加出口创汇的新的生力军。

他说，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展，首先必须继续发扬勤俭节约、因陋就简的精神。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初期，资金不足，不要急于铺新摊子。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厂房、设备，进口原料，进口零部件，搞加工、组装。产品打出去了，积累了资金，赚取了外汇，再置办一些新设备和基础设施。这样往前滚动发展。其次，必须保持劳动大军素质高、费用低的优势。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劳动力素质和劳动费用的高低。

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加强职工培训，努力提高职工素质。当前只有保持费用低而素质高的劳动队伍，我们才有希望，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切实提高管理水平，让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中国管理企业

赵紫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要向外向型经济转变，必须下大功夫加强企业经营管理。长期以来，不少工厂劳动纪律松弛，钱和物资的管理十分混乱。总之，企业经营管理落后，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方面造成的浪费大得惊人。比之国外，我们的有些设备是比较落后，但更为落后的是管理，管理上的差距，比设备上的差距更大。我们的企业劳动费用低、技术开发能力强、厂房设备条件好等许多优势，往往都被管理落后抵消了。这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改进和加强管理方面，各地出现了不少好的经验，例如在实行承包的基础上搞全面质量管理，满负荷工作法，厂内银行等。应当在更大范围内介绍和推广这类好的经验。

他说，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和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必须下决心搞承包。承包以后，两权才能真正分离，厂长的经营权才能真正加强。我在沈阳找厂长座谈，发现厂长的承包风险越大，权威就越高。有的地方在承包中推行集体风险办法，招标承包，搞好了大家得利，搞不好全体都有风险，少得奖金、福利。这样，你干不好要影响我，我干不好影响你，互相影响，大家一条船。总之，一承包，许多具体的管理经验就产生出来了，管理水平随之得到提高。现在不论是先进厂、落后厂，都有很大潜力。问题就在经营管理上，需要有一个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机制。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承包可以带来这样一个机制。

每个企业究竟用什么办法把管理搞好，可以在实践中创造。原则是要能人治厂。谁有办法把工厂管理好，给国家和职工都能带来利益，谁就来治这个厂。中国人可以，外国人也可

以；本地人可以，外地人也可以；大企业来治小企业也可以，小企业来治大企业也可以。办法就是承包、租赁、参股等等。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企业一下子都这样搞，可以一批一批消化。能先搞好三分之一，就势如破竹了。

他说，在“三资企业”中，要让外商直接管理，其中独资企业都是由外商直接管理的。合资、合作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也应让外商来管理，或以外商管理为主，让他们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所谓国际惯例，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包括在社会上公开招工，按照合同规定辞退工人等等。总之要创造一个使外国企业家能够象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管理企业的环境，投资环境好不好，最主要的是看投资者能不能赚钱。为此，关键的一条是让外商直接管理企业，尊重他们的管理权。中方的合法利益当然要维护。外商把企业管好了，多出口，多赚钱，我们也能从中得到应得的一份利益。

过去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就是认为让外商管理企业就是丧失主权、这种观念必须转变。现在世界上跨国界聘用职业经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大公司的经理，也不一定都是本国人。我们有的国营企业，如武汉的柴油机厂，也曾请“洋厂长”来管理，管得很成功。合资合作企业由外商来管理，只要管得好，更不应视为问题。

合资、合作企业让有管理经验的外商直接管理，或由外商在国外聘请人才来管理，对外商和我方都有利，好处很多。一是可以摆脱国内旧体制的束缚，摆脱关系学的困扰，进行严格管理；二是他更关心产品质量、技术更新和国外销售市场，并认真解决这些问题，使工厂出效益；三是他赚了钱，会吸引更多外商来投资；四是可以为我们培养现代企业管理人才；五为我们训练工人队伍，提高工人的素质。

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开发力量强的优势

赵紫阳说，我们的科技力量是比较强的。从发展中国家来讲，有我们这样强的科技力量的国家还不多。问题在于，由于政策上、体制上的原因，我们的这一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科技力量带来的加快发展的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性。要把科技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一是通过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竞争机制，推动企业关心科技进步；二是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使科技更好地为生产、为产品出口服务。为此，要把科技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为参与国际交换、国际竞争做贡献。科技人员积极而有效的参与，对于实现沿海发展战略非常重要。

他说，要改变一些科技人员看不起小企业，认为到乡镇企业去干有失身份的观念。其实，乡镇企业是最容易吸收科研成果的。科学技术与乡镇企业灵活的机制相结合，大有作为。

要打破科研与生产相脱节的现象。要把科研单位的利益与科研成果更紧密地挂起钩来，使科研单位能够依靠科研成果吃饭，这样就有竞争了。成果越好，越为社会需要，科研单位的日子就越好过。有人说，这样一来，大家都搞短期研究，不搞长期的了。这个不怕。现在短期性的成果并不是太多，而且还很不够。有一些带有长期性的课题，对国家或一个地方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长期科研课题，各级政府可列为计划内项目，给予特别重视和支持。谁来承担这样的重大课题，也要通过招标。

要允许科技人员直接办企业，特别是那些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有一种人才搞科研很行，经营能力差，他们就可以专门搞科研，发挥自己的长处；还有一种人既有科研能力，又有经营能力，就可以去直接办企业。在科研中心、学校周围，创办一些知识密集型企业，办一些

体现和运用科研成果的企业，对科研开发很有好处，对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很有好处。

如何推动科技工作，并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把科技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去，这是一个大课题，中央和地方都应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既要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又要稳定全国经济

赵紫阳说，当前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矛盾，一个是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矛盾，一个是沿海同内地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妥善处理，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求得一个合理的“度”和最佳选择。

我国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差别很大，要把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样搞得很快，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对我比较有利，沿海地区又有很多优势，如不利用这个机遇和优势来加快沿海经济的发展，那是很可惜的，是个很大的损失。可是，从全国来说，又必须稳定经济。二者应该统一起来。

他说，为此，首先要求沿海地区在采取进一步改革、开放措施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同全国稳定经济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和摩擦，特别是涉及物价问题的时候，步子要稳一点，尽量减少对内地的冲击和影响。全国稳定经济要考虑到沿海，沿海的发展也要考虑到全国。

第二，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要避免和内地争原料、争市场，一定要努力做到“两头在外”，向外向型经济转化，沿海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做到“两头在外”，具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有利条件。沿海地区只要坚持这样做，到国际市场上去显身手，就和内地减少了矛盾。

第三，沿海地区在利用外资的时候，要把重点放在兴办“三资”企业上，着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家举借外债的总规模，对稳定经济有利，经济效益也好。特别是要尽量吸引外资到老企业来，把利用外资同改造老企业结合起来，用我们现有的厂房、设备，与外商搞合作经营，不要都另外铺新摊子。吸引外资改造我们的老企业，由于有原来的基础，外资主要用在关键设备关键技术上，因而我方需要的配套资金就可以大大减少，这有利于国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总规模。另一方面，这些老企业的管理水平也能很快提高，尽快出效益，事半功倍。沿海地区认真抓好这件事，和内地不会产生什么矛盾，和稳定经济也没有矛盾，只有好处。

引进外资改造老企业并让外商来管理，需要解决好对原有资产的合理评估，原有管理人员的精简，多余劳力的安置等问题。因此，引进外资改造老企业，不仅可以节省配套资金，较快地提高老企业的技术水平，而且必将促进我们企业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意义很大。应当在这方面摸索经验，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把这件事办好。

第四，沿海地区发展经济，要多从当地开辟资金来源。要开源节流，搞好双增双节，提高经济效益，这是最主要的。沿海地区有许多不便管理而又长期亏损的小商店、小工厂，已成为财政包袱，可以拍卖给集体、个人或其他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拍卖之后，这些小企业本身的经营水平和经济效益会很快得到提高，国家也可以从中收回大批资金，然后用来进行重点建设，用来发展技术先进的企业，这对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是有利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也是一大财源，在沿海许多城镇，出卖旧房也可以筹集一大笔资金，并能促进住房制度的改革。要积极进行股份制试验，更多地把短期资金变为长期资金，以扩大建设资金来源。

（载《人民日报》1988年1月22日）

外向型经济：广东进一步改革 开放的选择和挑战

于 飞

广东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了第10个年头。过去九年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平均13.1%的速度增长。这是改革开放奉献给我们的第一个直接成果。中央最近决定，把广东省作为全面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为广东提前赶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带来了新希望。目前，我们正面临与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经济起飞时极为相似的国际经济环境。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及时组织经济战略转变，以更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交换和国际市场竞争，率先在我省沿海地带建成外向型经济，为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广东的历史贡献。

我省经济开始进入外向型发展轨道

1986年10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总结“六五”期间工作，研究“七五”期间的发展问题时，我曾讲过如下一段话：

“七五”时期对于我省对外经济贸易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都将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时期。“六五”期间我们所做的工作，已经使广东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连结在一起。今后，外经贸活动将进一步渗透到我省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整个经济将愈来愈深广地涉足于国际经济分工的各个领域，从而合乎逻辑地朝着外向型转变——这是我省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今后我省有可能成为一个“贸易省”。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估计，并据此相应地调整我们经济工作的方针。

今天看来，上述判断基本符合事态发展的实际。近两年广东已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机遇，增强了向外挤的力量，大步走上国际经济舞台。利用外资兴办出口生产体系以及出口贸易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根据测算，现在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有1/4是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其价值的；国民收入有1/4来自境外；建设资金也有1/4来自境外。这3个1/4直观地反映出广东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介入程度，很引人思考，令人振奋。可以认为，我们的经济已开始进入外向型的发展轨道。

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广东要不要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对此曾经有过争论。

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已经统一了大多数人的认识。长期以来的封闭型经济格局使广东经济增长速度曾一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今，广东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列上，已从原来第6位上升至第3位；出口总值居第1位，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6。究其原因，是开放以后经济运行摆脱了封闭式单循环的桎梏，生产要素流转开始走向国际化的结果。事实证明，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是一个符合国情、省情，扬长避短，实事求是的选择。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外向型经济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总要冲破地区和国家的界限；科学技术进步、大规模的生产分工、国际交换带来的比较利益，必然促使社会生产逐渐脱离一国基地之囿，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最终导致生产的国际化和市场的一体化。我们原来以为，可以依靠一个与国际市场相隔绝、相平行的国内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近代世界经济史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振兴民族经济。实行内向型模式的国家没有成功的例子，而采取外向型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则一般都大大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可以预见，我国或迟或早也会把外向型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导向。当然，我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逐步推进。而根据现有的条件，广东省则有可能也有责任先走一步。

发展外向型经济不仅仅是为了扩大出口，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我们民族经济的素质。考察出口总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对经济的外向程度作定量分析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外向型经济首先是一种经济结构，但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机制。它要求：从国际市场上取得收益作为主要目标；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商品生产；按照国际市场运转机制去从事经营；为国际资本运动提供良好的环境，为其他生产要素流转提供便利的条件。

要建设这种外向型经济，意味着广东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加快实施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这并非放弃国内市场，也不是不要承担对内辐射的任务。而是通过提高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的程度，促进内部经济机制的改善，带动整个社会生产优质、高效、快速发展。可以说，外向的问题解决了，内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我们面临着新挑战

未来的13年中，我们肩负着一个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任务，即推动广东经济实现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这意味着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主要是质量上的提高。我们将最终建成一个以国际市场为主要导向，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控手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一定要以新的姿态迎接这个挑战。

一、要进一步完善出口生产体系，努力培育一批大宗出口骨干商品，保证出口创汇持续增长有足够的后劲。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还在继续发生调整、重组。近年间“三来一补”贸易在我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应当继续抓住这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迅速扩充我省的出口加工能力。要有足够气魄和准备，承揽更多“三来一补”业务，来多少，接多少。但是，我们又不应该陶醉于目前“三来一补”订单纷纷涌至的热闹景象。要密切注视国际经济形势的每一个变动，未雨绸缪，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按既定的规划，加快出口生产体系建设步伐，培育自产出口骨干商品。

对外贸易一定要有一批大宗的、能够稳定出口的骨干商品作为支柱，目前我们排列出10大类商品，包括：鞋类、箱包、玩具、服装、木制品、塑料制品、家用电器、小五金、建筑材料、工艺品等。这些商品基本属劳动密集型，市场容量很大，需求长期稳定，根据现有条件，我们发展这些出口商品，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和可观的潜力。要下决心建立一批生产这类商品的骨干企业，配合以千家万户的承揽加工，迅速形成强大的出口加工生产能力。争取到

2000年使这类商品出口总额超过100亿美元。

可以预见，对外经济贸易今后将在广东国民经济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龙头。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外贸体制必须来一个“脱胎换骨”，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农）贸结合、产销结合。外经贸部门应该积极通过投资、参股、联营或与生产企业组成集团公司等方式，深入到生产领域中去，与生产部门共同建设一个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新的生产流通体系。

二、积极发展与出口生产相配套的原材料工业。

近几年广东出口生产、加工业发展迅速，但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未能与之相适应，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应立足于业已形成的出口加工能力，进一步向生产的上游求索，追踪发展与其相配套的原材料工业。

发展广东的原材料工业，不是搞“小而全”、“大而全”。我们近年的出口生产靠“吃”进口原材料为主，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问题在于如何提高我们对进口原材料的消化水平。因为过去吃的都是进口“精料”，而且有较强的依赖性。为什么不能把这种需求转化为刺激生产的动力？应该向前走一步，把某些原材料的生产从国外引到国内来。可以从后工序搞起，即把现有吃精料的加工业改造、发展成为能够“先将粗原料加工成精材料，然后再吃下去”这样一种两级加工体系，以此提高出口产品的境内附加值。发展的重点应是那些需求量大、长期依赖进口，并可以直接进入制成品加工工序的材料和某些原料。大宗原材料主要依靠全省统一安排建设大型项目来解决。但各地也应主动解决部分缺口、短线或特需的原材料生产和供应。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更应针对众多来料加工厂的需要，下决心上一批原材料和零部件生产项目，以便替代部分进口原材料，加强加工业基础，提高应变能力。

三、利用外资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提高水平。

今后13年，要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增长，需要有可观的投入。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要保持一个较高的积累率，以满足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此外利用外资的规模还要比目前再迈进一步，争取达到200亿美元。

扩大利用外资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继续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兴办“三资”企业。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我们仍要致力于投资环境，特别是其中“软环境”的改善，把更多的外商吸引进来。我们不仅欢迎外商前来办合资、合作企业，也欢迎他们来独资办企业。甚至完全由我们投资的企业，也可以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交给外商去经营、管理。这样做，并不是“出让主权”，而是针对我们企业管理落后的现状所采取的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此外，也要重视利用国际间接投资。要看到，一些发达国家把我们视为潜在竞争对手，希望我们在经济技术上始终与他们保持一段差距。我们难以期待他们在高技术的直接投资方面有大的作为。因此，应当利用国际资本间的矛盾有选择地利用国际间接投资，从国际市场选购我们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迅速形成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出优质产品再打回到国际市场上去。这也是一条“两头在外”的路子。

四、在十三大确定的总方针指导下，勇于更新观念，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发展外向型经济本身就是一场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按照市场机制和参与国际交换、竞争的要求，更新我们的经济体制。

随着改革的深化，某些固有的观念迫切需要更新。譬如，今后是否一定要把企业划分为外贸、内贸两类？所有企业能否做到，只要产品符合国际市场要求，都可以经营进出口，不存

在内销、外销之分？工商企业是否要严格划定经营范围，不得越雷池一步；能否互相交叉，逐步发展到象国外企业那样，可以从事“法律所不禁止的一切业务”？外汇是否可以象其他商品一样进入市场？国营企业能不能把部分资产股份让给劳动者个人持有？效益不好的国营企业能不能被集体企业收购，或被另一家效益好的国营企业“兼并”？企业和行业是否一定需要有某个行政主管部门当它们的“婆婆”？政府机关能不能逐步放弃对企业活动范围、行为方式进行事前审批的做法，把“管”企业转为引导企业按照国家法律和市场机制办事？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如何有利于加快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有利于整个经济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换、竞争的角度出发，来作出判断、决定取舍。

改革必然要表现为突破某些现行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规范的否定。今后的十多年，仍将是一个新旧体制逐步更替的时期，在新体制对旧体制的淘汰过程中，不可能每一步改革都得等待中央“一声令下”才迈出。过去，我们只习惯于做政策、法律有明文规定“可以做”、“如何做”的事情，既不用冒风险，也不用担责任。但这是一种窒息创造精神的气氛，是一种没有活力的机制。今后，应该把这个顺序倒转过来，形成一种新观念：即：凡是法律不禁止的事，都可以去做。要创造一种鼓励和促进改革、开放的政策法律机制，使政策、法律更积极地服务于我省改革的超前试验，服务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对国家赋予广东现有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们要充分理解其精神实质，努力使其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换句话说，是“用足政策”；对于某些已被实践证明不适应我省实际、不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要求的具体规定，要适当地灵活变通。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在“走钢丝”，搞“边缘政策”。其实，这恰恰是正确处理推进改革与遵纪守法二者关系的表现。任何一个勇敢而又清醒的改革者，都应该在这二者之间掌握好一个适量的“度”。既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看准了就大胆干，敢于承担风险；又要顾全大局，悉心谨慎地处理每个具体问题。

我们要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和负责精神，在自己的岗位上，推动我省、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前进。

（本文作者是广东省副省长）

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

王 建

一、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矛盾

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向成熟的工业化的社会迈进，这个过程可能要延续到下个世纪中叶。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而其基础是深刻认识我国走向成熟工业化阶段的大背景和主要矛盾。

与国际比较，中国走向成熟工业化阶段的大背景，具有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跃过了以轻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一个相对

发达的重工业基础；而从农业劳动所占的比重看，仍处于低度发达阶段。二元化结构特征比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更鲜明。

形成这种特殊产业结构的基本原因是：（1）国外敌对关系的长期存在，逼迫我们加快重工业的步伐，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积累用于准备打仗，不能用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2）受苏联模式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的影响，忽视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战略选择倾向于重工业超前发展。（3）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也给利用超市场力量、越过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而形成这样的结构，提供了可能。

这种高度强化的二元结构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矛盾是，从我国工业发展所处的阶段看，下一步目标应当是向产业结构高级化方向迈进，要求加强资金密集型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加工工业建设，这需要大量资金；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解脱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长期束缚，巨量人口要向非农领域转移，也需要大量资金来武装。由于每年可以用于积累的资金有限，就出现了工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争夺资金的矛盾。继续用强制的办法不准农村劳动力转移来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已不可能，而且不解决八亿农民走向工业化的问题，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也不可能真正完成。但允许大量人口进入非农领域，又无疑会降低非农领域的有机构成，使工业结构向轻型化偏斜，阻滞我们的推动工业结构高级化的步伐。这个矛盾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也是制约我国下一个发展阶段战略选择的主要矛盾。长期以来，僵化的、排斥市场的经济体制，使企业缺乏活力，因而微观经济效益低下，加剧了这个矛盾。这个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在宏观上造成社会经济效益的巨大损失，将可能使我们既无法达到既定的工业化目标，又无法保证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降低经济发展速度。

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建设起一个庞大的近代工业，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在积累资金有限的条件下，二者发挥优势的前提都是要争到大部分积累资金，这样就可能把两个优势变成劣势。所以我们制定发展战略的目的，就是化劣势为优势，变不利为有利，为矛盾的转化创造条件。

二、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摆脱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两难处境，可以有多种战略选择。

一种选择是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实际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在走这条路，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继续走下去的矛盾已经开始暴露。首先在于农、轻产业的发展要以扩展国内市场为前提，这就要求提高国内消费率。但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恰恰要求提高积累率，否则就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我国借入外债较多，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较高的积累率。单从国内收入用于积累部分看，现在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这与近几年走这条路取得成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可是这种状态不可能长期维持。而且，这种选择不可能充分发挥重工业的优势。

第二种选择是走借外债的道路，用国外资金补足国内积累，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这种发展战略，亦已取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按照取得成功的国家人均外债水平借入外资，我国外债余额就要达到一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积欠外债的总和。且不说发达国家是否肯借给我们，即使我们能筹集到这么多资金，也无法还本付息，因为我国的出口能力与还债规模根本无法适应。比如，就是按每年还本付息额占外债总额5%这样低的水平考虑，当年出口额也要至少达到2700亿美元以上。

第三种选择是发展机电产品出口，通过国际交换为重工业自身积累资金。这种选择可以避免重工业发展与农、轻产业发展争夺积累资金的矛盾，难题在于，国际贸易80%是在发达国家间进行的，由于我国机电工业技术水平的限制，目前很难大规模进入发达国家间以同等技术水平为基础的贸易圈内。而若首先致力于提高国内重工业的技术水平，仍然会产生与农业劳动力转移争夺积累资金的矛盾。而且，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也不能发挥。

第四种选择是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外汇可以代表一切资源的供给，有了外汇就可以取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为矛盾的解决提供转化条件。

上述四种发展战略选择，我主张选择第四种，即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的总体发展战略。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我国农村大约需要转移出1.8亿劳动力。按目前轻工业的容纳能力，如果到2000年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体的出口产品额达到1500亿美元，则可大约解决6千万人的就业问题。根据较保守的估计，今后二次产业与三次产业间就业岗位增加的比例为1比2，这样就可以由于二次产业的发展，再带出1.2亿劳动力，大体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到本世纪末要求出口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后十几年的出口增长率就必须达到12%以上。这个目标既高也不高。日本、巴西、南朝鲜在经济起飞的十几、二十多年中，出口增长率分别长期保持在17%、16%和40%的高水平上，他们都依靠外向型战略取得了成功。日本走这条路是因为没有资源，南朝鲜走这条路是因为没有市场和资金，我国则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各国国情不同，但走外向型道路却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只要认准这条路，下决心集中力量发展出口，就有希望取得成功。特别是目前发达国家和前列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的新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让出更多的传统产业市场，我们的外贸发展应当抓住这个机会。

可以设想，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手段，解决结构优化和建立新的良性循环关系的发展战略，大体要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集中力量发展轻纺、食品饮料、家用电器、轻工杂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重点首先摆在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这一阶段需要暂时牺牲重工业自身的发展，重工业的任务是支持轻纺产品走出去。换得的外汇，一部分可用于加强重工业的服务能力，一部分直接用于引进技术和原料发展出口。这个阶段还要加强国内尤其是内地的交通运输建设，为出口产业向中、西部扩展创造条件。当沿海产品向外走时，内地产品首先努力占领本地及国内市场，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为向外走打好基础。这一阶段大约需要5到7年时间。

第二阶段，内地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创汇能力增强，可以用大部分外汇支持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的发展，过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这一关。亦需要5到7年时间。

第三阶段，以换回的外汇重点支持附加值高的重加工业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开始下降，劳动力转移压力逐渐减轻，就业者开始向重加工业产业转移。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高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这一阶段大约从“九·五”后期才能起步。

我国有较雄厚的重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能力支持外向型轻工业的发展，将使我国劳